



# 当代文坛的珍贵记忆

—吴泰昌“亲历大家系列”丛书笔谈

吴泰昌“亲历大家系列”丛书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首辑《我知道的冰心》《我亲历的巴金往事》和《我认识的朱光潜》三本书从各个侧面展现冰心、巴金和朱光潜三位文学大家的风采。作者从与这些文坛前辈大家的亲身交往入手，以大量第一手感性材料为基础，配合书信、题赠、签名书籍、照片等实物资料，道他人所不知或未详，兼具文学与历史价值。兹刊发一组笔谈，以飨读者。

——编者

## 应重视对作家生活经历的研究

□邓友梅

吴泰昌是我的老朋友。他的“亲历大家系列”首辑所写的巴金、朱光潜、冰心三位老先生我也都很熟悉，特别是冰心。作者我认识，被写的我也认识，所以读这三本书我感到很亲切。也许可以找到比吴泰昌写得更好的文章，但对三位文坛大家写得那么具体、那么亲切、那么形象的书很难找，这三部作品确是难得的好书。

读这三本书，还让我产生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研究作品的多，对作家本人的生活和经历研究的少。但实际上作家的生活和经历对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吴泰昌的这三本书是对几位大家生活和经历的珍贵记忆，也是对当代文坛和当代文学的珍贵记忆。他的这套书有很重要的历史和文学意义。

## 仰视“大写的人”

□吉狄马加

多年来，我与泰昌先生交往甚密，并且一直是他优美散文的忠实读者。泰昌先生的文字就像他的为人一样，表面看起来很随意、很恬淡，易于接近和理解，但内涵中却充满了细致、认真和深刻的执著。泰昌先生的文字继承了我国特别是五四以来重要的散文传统，让人联想到林语堂、朱自清、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作家的文风。我认为泰昌先生的散文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学者的深邃大气，二是诗人的敏锐简洁。应该说，他在中国众多的当代散文家里已经独树一帜。

读泰昌先生的散文，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无论写人还是纪事，他的文字里都透出一层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显示一种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他总是站在一个更加高远的层面观察和描述。我相信，这与他长期在北京大学师从名家大师得来的丰富学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些深刻的意义和思想，却是通过一种极其简朴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这是个性化的语言，诗的语言。我历来有一个观点：真正的散文，一定是用诗语言写出来的，文字纯粹、鲜活、饱满，简朴而不苍白，凝重而不繁杂，优美而不浮华。能够运用充满张力的朴实话语写人纪事，对散文家来说，除了卓越的语言修炼之外，更需要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刻理解。因此泰昌先生的散文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在喧嚣与躁动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洪流中，泰昌先生的精神和文字，送来一股高贵的玉兰花香，吹来一缕凉爽的原野清风。所以我读泰昌先生的散文，既是学习领悟他的思考与见解，也在享受他的智慧。

泰昌先生和郭沫若、钱锺书、巴金、冰心、朱光潜先生等都有近距离的接触，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是令人羡慕的幸运和机遇。读他的散文，不仅感受到语言创造本身的美，而且由于他对亲历的人和事都经过了心灵和思想的长久过滤，从而让我还能看到文坛大家的美好心灵，领悟前辈大师的深刻思想。他的作品里所写的这些文学大家，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言人；他写的这些人，应该说都是“大写的人”，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

泰昌先生亲历并且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坛不同时期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叙述实际上也反映了时代重大的变迁。这种对文坛重大事件的回顾其实也是对时代的一种深刻的记录。前苏联作家爱伦堡曾经写过《人·岁月·生活》，记述自己所经

▼百家品书

# 《北京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十五年的记忆

□兴 安

在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之际，“《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丛书”正式出版发行。丛书分四辑，分别是《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受戒》《喜鹊登枝》和《记忆与足迹》（最后一辑即将出版）。

第一辑收入了《北京文学》自1950年创刊以来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其中有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方之的《内奸》、陈建功的《丹凤眼》、林斤澜的《头像》、刘恒的《天知地知》、刘庆邦的《鞋》等，这些小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和新时期以来国内小说创作的标志性作品。第二辑收入了吴晗的《海瑞罢官》、王蒙的《风筝飘带》、汪曾祺的《受戒》、余华的《现实一种》、李陀的《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乔典运的《问天》、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兴安的《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的一种方式》、王小波的《万寿寺》、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雷达的《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铁凝的《逃跑》等，这些作品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没能获奖，但在当时乃至今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轰动和影响，尤其是《海瑞罢官》《受戒》《现实一种》《预约死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对后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和走向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三辑收入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庆邦的《走窑洞》、徐小斌的《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苏童的《桑园留念》、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荆永鸣的《外地人》、浩然的《喜鹊登枝》、张辛

欣的《在静静的病房里》、王安忆的《雨，沙沙沙》、沈宏非的《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等，这些作品或是这些作家的处女作，或是他们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应该是张洁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虽写于30年前，可至今仍被人们阅读和谈论。《走窑洞》《十八岁出门远行》《伏羲伏羲》分别是刘庆邦、余华、刘恒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们真正找到自己的涅槃之作，由此他们才真正在中国文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浩然的《喜鹊登枝》、王安忆的《雨，沙沙沙》是处女作，前者发表于1956年，当时浩然只有24岁。据他回忆《喜鹊登枝》写出后，自己十分喜欢，赶紧寄给了一家刊物，不料却被退了回来。他非常心疼，“像一个难把孩子养活的妈妈，把它送给孤儿院那样给了《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前身），得到两位女编辑的赏识，才把它救活”。《雨，沙沙沙》发表于1981年，当时王安忆只有25岁。虽然严格说，王安忆的处女作是《平原上》，发表于1978年，但她在多种场合和文章中都承认，《雨，沙沙沙》才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在《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序言中，她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一阶段，是从《雨，沙沙沙》开始，这也是我整个文学生涯的开端。”而沈宏非的《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封笔之作，写完这篇小说之后，他就开始专心报刊专栏的写作，成了影响一方的随笔名家。

关于这套丛书的价值和意义，前言中已经述明：“以上4辑图书，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北京文学》60年走过的风雨历程，展现了60年来的重要作品和不同时期的刊物风貌，也基本上代表了60年来《北京文学》作品



的最高水平。”“60年的《北京文学》，承载着我们的共同理想，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智慧与汗水，也镌刻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与足迹。值得欣慰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构成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得在《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时，也出版过一套丛书，但现在这套丛书我以为更有特点和意义。

在入选的作品中，有不少是我亲自约稿和编辑的，比如刘恒的《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庆邦的《鞋》、毕淑敏的《预约死亡》、沈宏非的《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

等等。现在看到这些作品，想起那些往事和经历，感觉恍若隔世，又似近在眼前。

顺便一提的是，在这套书中，我15年前的理论文章《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的一种方式》有幸入选，我很欣慰，它使我想起1994年《北京文学》的风光，想起那些发起和参与“新体验小说”写作的作家和同事们，各地作家与文学杂志风起云涌，那是中国文学的一次激情逆现。虽短暂，但充满欢乐。我感激当时刊物的主持傅尊生和傅峰老兄，前者对我的信任，给了我斗胆考察和阐释“新体验小说”写作以及当时国内文学状况的信心和动力；后者对这篇文章的肯定和建议，让我受益至今。我更感谢现在《北京文学》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使我这篇蒙尘的文字得以重见天日。

不久前，《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庆典在亚洲大酒店举行。我作为曾经在《北京文学》工作过的一员参加了这一盛会。在会上，我见到了我的老领导老同事，还有多年不见的老作家老作者，心情异常激动。那些熟悉的但却被岁月沧桑的面庞和笑脸，激活了我过往的记忆和对逝去的快乐时光的怀念。我23岁来到《北京文学》工作，直到38岁离开，整整15年，可以说，我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北京文学》和《北京文学》也铸就了我文学一生的追求和痴恋，使我至今无法回头，并且无怨无悔。虽然文学和文学杂志越来越边缘化了，但是我希望《北京文学》就像文学的生命一样长久，只要文学还在人类的心灵中发挥着作用，《北京文学》就永远走在文学的最前沿。

（《北京文学》创刊60周年丛书，同心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出版人在线

## 以人为本，建设出版人才队伍

□庞检克



在出版产业转企改制的转型期，出版企业如何做强做大，驶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笔者以为，建设好以人为本的人才机制是重中之重。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裁杰克·韦尔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CEO之一，被誉为“经理人中的骄傲”、“经理人中的榜样”。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全球前500强经理人大会上，有人请杰克·韦尔

奇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领导艺术，他回答：“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这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用人的成功与否是企业成功的决定性条件。

首先，他把公司的成功归结于是否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招到自己身边。

古代贤哲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说到底也是人的竞争力。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员工是企业的主体，是企业财富和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员工是企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们创造了企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做什么，怎么做，都得靠员工。显而易见，一个企业，如能围绕战略目标的实现，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就占了先机。人才问题是观念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现实问题，也是长远问题。有战略眼光的经理人，无不把人才问题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优先考虑解决。凡大成功的企业，无不济才济民。

其次，他把管理者的成功归结于发现、使用、爱护和培养人才。

古人说，“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韦尔奇等优秀的经理人，用实践回答了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的课题，回答了以人为本是企业的核心问题。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相信人、依靠人、为了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的根本利益，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建设企业文化，共同谋求企业的发展。凡大成功的企业和经理人，无不打造适宜人才引进和成长的人文环境上做足文章，这也是检验企业管理人员的分水岭——有发现的眼睛，有爱护人才的胸怀，有培养人才的远见，有和员工平等对话的尊重，有打造人才团队发挥创造力，激发生产力平台的举措，为人才的成长创造积极向上、和谐宽容的环境，就在使用、爱护、培养人才方面做了扎实有效的基础工作。他们用人格的魅力感染人，用优惠的政策留住人，用发展的平台吸引人，用优秀的企业文化造就人，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到团队中来，团队就会创造出更优异的业绩，如此便进入良性循环。

其三，韦尔奇的“活力曲线”用人规律，体现出他作为成功经理人的人道情怀和高超领导艺术。对最好的20%和最差的10%的奖惩，不为别的，为的是用成功的人，带动中间状态的70%。请注意“带动”这个词。这是经过无数实践证实了的科学有效的正面激励方法，也是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试金石。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给更多的人发展的机会，成就的机会，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企业才能积蓄强大的人才队伍，拓展更多的产业链条，从而越做越强，越做越大。显然，韦尔奇的做法值得称道。而对那10%最差的人，同样需要正面引导激励，发现并放大这些人的长处，让他们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合适的事，就能变惰性为动力，变差为优，企业的发展就会多一份助推力。以稻田和夫、松下幸之助“敬天爱人”“永远雇用”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文化，贯穿的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企业哲学。

上述韦尔奇关于人才的三条体会，互为关联和补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我国出版产业面临转企改制的历史转折时期中，以内容资源整合为主要任务的传统出版业，解决好人才问题是出版社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引进人才，人尽其用，解决好人力资源与规模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因地制宜，为人才的成长搭建平台；如何拓展领域，打造更多的产业链，为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机遇；如何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凝聚力，为最广大的群体创造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摆在当代经理人面前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实现这个目标，韦尔奇等成功经理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作者系漓江出版社副总编辑）

▼书说新语

## 很多风景不能贸然进入



根在农村的人，无论在外面多广阔，你也改变不了农村。你可以不回来，在外面牛皮哄哄，但只要回来，就得接受农村的同化、熏染、复苏。秋冬相交，“无边落木萧萧下”，天蓝得透明，去掉绿阴的树木凌空烙出自己的枝丫，有一种水墨画简洁的线条美。村庄在一片澄明、安静中，真的包含着万物，真的令人向往。城市的高楼大厦这时候算个啥？

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拐点，一想到清冷的堂屋、露天的厕所、擦不尽的尘土与雨雪过后潮湿的柴禾，那镶嵌在秋色里静美的院落就打了折扣。由此可知，很多风景只是是用来看的，而不能贸然进入。当然，不做远观者彻底沉浸进去也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刚进城市时，不也是仰望高楼而目眩吗？进出某个环境，都会有不适的，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熟悉的地 方没有风景”，那是超越了的高蹈之士的想法，至于我等保守之辈，熟悉的对方才有炊烟！暮色在乡村极美。炊烟袅袅，晚霞金红灿烂，干了一下午的农活，走在回家的路上，少年姐弟打闹着，已没有刚下地时对农活的烦闷，是充实而快乐的。暮色昏黄，则源于身处异地的不适。漂泊的人终要找一个地方栖下，蜷缩着，靠家的暖的记忆过夜。长大了，暮色就渐渐渗到心里去了。有时候，在一个人的脸上，你看得出他心里的暮色。

（节选自《青衿黄冠》，庞永力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